



乡村教育难题与主体弱化说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钱民辉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博士后，中共浙江省委党校社会学文化学教研部讲师 陈旭峰

【摘要】乡村教育的功能不仅仅是教人识字，更重要的是传承乡土文化，促进乡土社会文明。因此，发展乡村教育的思路都要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还乡村教育主体地位。文章主要是对乡村教育主体弱化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通过分析其产生的原因，试图找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和路径，以期对我国乡村教育在今后的生存与发展有所帮助。

【关键词】乡村教育 主体弱化 难题 路径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乡村教育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但是其关注点更多的是考虑如何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将乡村教育并入城镇化和城市化发展之中。在这一思维下，乡村教育的主体弱化就成为必然。乡村教育的功能不仅仅是教人识字，更重要的是传承乡土文化，促进乡土社会文明。因此，所有发展乡村教育的思路都要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还乡村教育主体地位。文章通过分析乡村教育主体弱化的原因，试图找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和路径。

乡村教育主体弱化之原因

乡村学校的布局调整。乡村学校的布局调整有两个背景，一个是人口背景，在城市化进程影响下，大量乡村人口外出打工向城市流动，同时，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乡村的人口出生率持续降低，导致乡村的入学儿童数量不断减少。乡村入学儿童数量的减少使得不少原先规模就较小的乡村学校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另一个是改革背景，在规模效应的导向下，我们国家很多领域都掀起了一股“撤并”风，如以“大部制”为代表的政府部门撤并、以乡镇撤并和村庄撤并为代表的行政区划调整。改革背景对乡村学校布局调整的推动作用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在规模效应的影响下，政府部门认为规模小对乡村教育来说是不利的，只有扩大学校的规模才能更好地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提升学校办学质量。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很长时间内，我们国家乡村学校的布局往往是根据村庄和乡镇的建制来布局的，其特征是：“村有小学、乡有初中”。而行政区划的调整对乡村学校的布局调整带来了直接影响，乡镇撤并和村庄撤并推动乡村学校的布局也相应调整。因此，在人口和改革这两个背景下，乡村学校的布局调整如火如荼的进行着，不少规模较小的乡村学校被撤并。其造成的结果是：伴随

着很多村庄的消失，乡村学校也日渐消亡。乡村学校布局调整的过程也是一个乡村学校不断“上移”的过程，也就是不断靠近城市、远离乡村的过程。对于乡村教育来说，离开了乡村社会，就失去了其生长的土壤，也就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可以说，乡村学校的布局调整使得乡村教育的主体地位不断弱化。

教育被资本“绑架”。在中国的传统乡村社会，以科举制为代表的教育对资本的要求并不高，四书五经这几本书对于乡村的平民来说也是能够买得起的，这对其实现阶层流动是非常有利的。美籍华裔学者何炳棣教授通过对明清48份进士登科录的12226名进士家境进行分析表明：明清两代来自平民阶层的进士占42.3%。这一数据非常有力地证明了传统社会的科举制度对乡村平民实现阶层流动的重要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很长时间内，在政治因素的影响下，教育对资本的要求也是不高的，在特定历史时期甚至出现了越穷阶层流动的机会越大这样的奇特现象，那一时期乡村平民实现阶层流动的渠道是畅通的。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日益加速，特别是随着中国教育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教育被资本“绑架”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备受人们关注的择校热、各种类型的辅导班都是教育被资本“绑架”的典型表现。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的改革历程是一个“国退民进”的过程，这不仅适用于经济领域，也同样适用于教育领域。国家资本不断从教育领域抽离出来，民间资本不断进入教育领域中。如果把计划经济时期的教育比喻成“国家请客，国家买单”的话，那么市场化改革之后的教育可以比喻为“国家请客，社会买单”。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接受教育的成本就大大提高了，特别是对于优质教育来说更是如此。市场化改革之后的教育成为了商品，人们必须借助于一定的资本才能进入教育市场，而大部分受教育者只能通过家庭来获得资本，此时，家

庭资本成为了影响教育获得的关键因素，由此人们跨入了一个“拼爹”的时代，这也注定了那些来自资本匮乏家庭的受教育者很难获得优质教育，他们在起跑线上就已经输了，进而影响到其阶层流动的实现。可以说，教育资本化对于乡村教育来说是非常不利的，此时教育更多的是在发挥阶层固化作用。在教育资本化的影响下，乡村教育只能处于弱势地位，主体弱化在所难免。

教育的“名实分离”。完整的教育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社会个体化”，也就是把社会的知识传递给个人，这是一个受教育者接受知识的过程，其结果是在个人身上能发现社会的影子；另一方面是“个体社会化”，也就是通过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去“改造”社会，这是一个受教育者生产知识的过程，其结果是在社会身上能发现个人的影子。这两方面内容其实我们并不陌生，“社会个体化”主要对应于学校的应试教育，而“个体社会化”则主要对应于学校的素质教育。国内关于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讨论已经很长时间了，而且这场讨论早已有定论，就是要弱化应试教育，强化素质教育。但是我们发现：教育的“口是心非”问题太严重了，大家说的都是要加强素质教育，但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都是强化应试教育。这也就造成了教育的“名实分离”，似乎大家都已经形成了共识，在名义上按照素质教育去做，但实际上却按照应试教育去做。可以说，乡村教育主体弱化与教育的“名实分离”有着紧密联系。我们知道，应试教育的衡量标准是高度标准化、统一化、数量化的。由于教学软件硬件等条件的差异，乡村教育是很难在与城市教育的竞争中胜出的，这就使得乡村学校在应试教育中只能处于劣势。

乡村教育中家庭教育的缺失。对于教育来说，家庭教育是不可或缺的，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在传统乡村社会中，学校教育也就是私塾教育对于人们来说是可有可无的，因为只有那些希望通过功名实现社会流动的人们才需要接受教育。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对“文字下乡”的论述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他认为传统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文字下乡”是没有必要的，再加上传统社会人们从事农业生产的技能往往也是在家庭教育过程中习得的，因此在传统乡村社会人们接受教育的意义并不大。正是学校教育的可有可无恰恰凸显了家庭教育在传统乡村社会中的重要性，加上传统社会中家庭往往是指一个大家庭，也就是家族的意味，传统乡村社会中的家庭教育甚至也涵盖了社会教育在内。因此，传统社会的乡村教育是由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位一体”组成的。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现代学校教育对乡村社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相比之下家庭教育的作用和对孩子的影响开始日渐式微。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乡村大量人口的向外流动，留守儿童的规模越来越庞大。根据全国妇联2013年发布

的一份报告显示，我国乡村留守儿童数量超过6000万，总体规模仍然在不断扩大。因此，留守儿童在乡村学校中所占的比例是比较高的，特别是对于那些劳务输出大省来说尤为如此。对于乡村外流人口来说，他们在城市的工作和生活也非常艰辛，表现在工作强度大、收入水平不高、闲暇时间少等方面，再加上地理空间的限制，他们是很难有效履行父母职责。因此，留守儿童大部分都是通过隔代抚养和教育，但是很多家庭教育的内容和功能往往是不可替代的，其结果就是造成乡村教育中家庭教育的严重缺失。因此，家庭教育的缺失也使得乡村教育的主体地位不断弱化。

破解乡村教育之难题的可能路径

通过上述原因和本文的分析，我们认为要想切实解决乡村教育主体弱化问题，以下四个方面应该是可能的路径：

重新确立乡村社会的主体地位。我们知道，教育不仅仅是教育自身的问题，而是与经济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很多教育问题往往是社会问题的反映。如果把教育比作一棵树，那么社会则是教育的生长土壤。教育这棵树能否成为参天大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这一土壤的肥沃程度。如同离开乡村社会来谈乡村教育是不切实际的一样，如果没有确立乡村社会的主体地位来谈乡村教育的主体地位也是很难想象的。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我国一直是一个农业社会，重农的思想和特征非常明显，因为农业是整个国家的根基所在。因此，在传统社会中，乡村社会的地位是非常高的。但是，近代以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人类社会逐渐由农业社会跨入了工业社会，在这一背景下，以农业为特征的乡村社会在与以工业为特征的城市社会的较量中败下阵来，乡村社会的地位一直处于下降态势。很长一段时期内，现代化的进程往往成为了城市化的进程，也就是乡村不断学习城市，在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上不断向城市靠近。其结果是乡村社会日益成为了城市社会的附属品，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变成了依附关系。因此，在现代社会中，乡村社会的主体地位已经动摇了。这也就意味着：要想解决乡村教育的主体弱化问题，首先必须要解决乡村社会的主体弱化问题。因此，我们要高度重视乡村教育与乡村社会之间的紧密联系，必须首先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重新确立乡村社会的主体地位，在此基础上才能更进一步来考虑确立乡村教育的主体地位问题。

乡村教育应“去资本化”。卢梭在其名著《爱弥儿》中说道：“什么是最好的教育？最好的教育就是自然而然的教育：学生看不到教育的发生，却实实在在地影响着他们的心灵，帮助他们发挥了潜能，这才是天底下最好的教育。”教育的本质在于促进受教育者身心的健康发展，而教育的市场化改革改变了老



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由传道授业解惑的师生关系变成了商品买卖的交易关系。教育资本化使教育充满了“铜臭味”，教育的“唯利是图”特征越来越突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功利主义思想也越来越浓厚，这对于受教育者身心的健康发展是极为不利的。意大利著名教育家蒙台梭利说：“教育首先要引导孩子走独立的道路，这是我们教育关键性的问题。”教育资本化注定了受教育者只能依赖于家庭，决定了受教育者不可能走独立的道路。

同时，教育资本化从各个方面增加了学生的负担，这些负担既有来自于学校的，也有来自于家庭的，这也决定了受教育者不可能走独立的道路。在教育资本化影响下，学校成为了一座工厂，校长是这座工厂的厂长，老师是车间主任，而学生则成为了工人，学生每天的学习就像是在生产流水线上不断的罐装着“知识”。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4）》中，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学者程平源对2013年媒体报道的79例中小学生自杀案例进行研究分析后发现，学习压力过大是学生自杀的主要原因。由此可见，教育资本化对学生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教育是一项塑造人类灵魂的工程，教育的资本化也就意味着人类的灵魂被出卖了。我们可以发现：当下的教育离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日渐远去。只有“去资本化”才能回归乡村教育的本质，因此，乡村教育“去资本化”已经变得日益迫切。在乡村教育“去资本化”过程中有两个问题是需要特别注意的：第一个问题是不能按照西医的方式“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要按照中医的方式全方位调理；第二个问题是“去资本化”并不是乡村教育改革的最终目的，而是乡村教育改革的一种手段，其最终目的在于通过“去资本化”来加强乡村教育的人文关怀，通过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本主义教育来确立乡村教育的主体地位。

发展“名实相符”的乡村教育。在上面的原因分析中，笔者探讨了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之间的对立问题。人们说的是素质教育，做的是应试教育。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呢？有两方面的原因是必须注意的。第一个原因在于升学率、优秀率等教育评价指标具有很强的应试教育特征，迫使学校、老师、家长都跟着这根指挥棒走。因此，要想改变教育的“名实分离”现状，就要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教育评价指标，弱化教育的应试教育特征；第二个原因是更为重要的，整个社会把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放在了一个完全对立面，至少从观念上来说是这样的，认为应试教育是落后的，一无是处的，应试教育被“污名化”的现象非常严重。应试教育在与素质教育的竞争中胜出，其造成的结果是：乡村教育只能处于弱势地位。因此，为了扭转乡村教育的不利境地，必须要实现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因为素质教育不像应试教育那样的高度标准化、统一化、数量化，而是以非标准化、非统一化、非数量化为考核标准。

在这样一种考核标准之下，城市教育就失去了其原有的优势，乡村教育的劣势也就不再是劣势了，能够更好的体现出“公平竞争”。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乡村教育还可能会具备一些城市教育所没有的优势条件。这就犹如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之后，很多原先比较落后的地区，原先作为劣势条件的自然环境反而成为了其发展的潜力，在经济学里这叫做比较发展优势。教育的“名实分离”在乡村教育身上还直接表现为说的是乡村教育，而做的是城市教育。乡村教育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能够扭转这一状况，使乡村教育说的做的都是乡村教育的内容。

引导新型人口流动模式。乡村学校的布局调整和乡村教育中家庭教育的缺失都与乡村人口流动有着直接的联系，因此，要想解决乡村教育的主体弱化问题，就必须解决一个人口“回流”问题。只有人口“回流”了，乡村学校才能“下移”，乡村家庭教育才能“跟上”。根据乡村人口流动的特征，按照理想类型可以将其分成四种类型：第一种是“离土离乡”型，这是指那些长期外出务工不再从事农业生产的乡村流动人口；第二种是“离乡不离土”型，这是指那些短期外出务工有时会回乡务农的乡村流动人口；第三种是“离土不离乡”型，这是指那些在当地务工不再从事农业生产的乡村流动人口；第四种是“不离土不离乡”型，这是指那些在当地边务工边务农的乡村流动人口。

改革开放以来很长时间内，东部地区对人口的“拉力”，中西部地区对人口的“推力”都是比较的，从而形成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近年来，我们发现：东部地区对人口的“拉力”、中西部地区对人口的“推力”都在慢慢变弱，其原因在于东部地区的发展优势逐渐变弱，而中西部地区的后发优势逐渐显现。同样，城乡之间的推拉作用也在发生着这样的微妙变化。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很长时间内乡村人口的流动类型属于“离土离乡”、“离乡不离土”这两种类型，那么当前属于“离土不离乡”、“不离土不离乡”这两种类型的流动人口越来越多。我们知道人的因素是最重要的，如果人都没了很多问题都是空谈，而“离土不离乡”、“不离土不离乡”这两种类型的人口流动能够很好的实现乡村人口的“回流”。只有乡村人口“回流”了，留住了，才能从根本上真正解决乡村教育的主体弱化问题。

人民论坛

责编/张蕾